

王蒙旧作新发的意义质疑

施 津 菊

摘 要:王蒙今年出版的创作于1978的旧作《这边风景》,引起文坛热议。如若从小说的主题设置、叙述模式、形象塑造以及那时“政治”化的文学腔调看,都乏善可陈。文中的地域性特色因游离了故事与情节也显得有些牵强。而与小说叙事的历史感互为悖论的“小说人语”,置于文本整体中,似有蛇足之嫌。这个患有“先天”“绝症”的“已经逝世”的文本,实没有起死回生的必要。

关键词:王蒙;《这边风景》;民族特色;小说人语

因为笔者曾经有过在伊犁生活20多年的经历,得知王蒙近期出版的旧作《这边风景》是写伊犁生活的,以对作者以往作品的大致了解,便怀着一份特别的期待了,或许,是另一个“楼兰美女”的惊艳出土?一看到首页插图突显出维吾尔人的那种欢快与阿凡提的小毛驴时,感觉还不错,不过随着对目录的浏览,就感到自己的期望怕是太高了。及待读完,可以说是大失所望。小说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于各种批判运动层出不穷的时代,到处充斥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情绪。故事发生在自中苏边境“伊塔事件”前后到“四清运动”结束这段时间的新疆伊宁巴彦岱,叙事中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是可以理解的。但文本创作于“文革”后期,初稿完成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7日,当时的社会其实已经涌动着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的思想情绪了。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巨大反响即是佐证。之后的3年里,当代文坛日新月异,大有引领社会思潮的势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在反映思想剧变与社会转型方面也是后浪紧推前浪。作者虽在那个历史激变的机遇中试图修改但并未能使文稿的历史感与文学价值起死回生,那么,今天再拿出来出版,即使加上了“小说人

语”的部分,又能具有怎样的新的意义呢?

因伊犁毗邻苏联边境的地理位置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构成,又逢当时中苏关系的阴晴不定,边境局势常有剑拔弩张的态势,国内与国际的社会政治生活自然成为小说叙述的着眼点。故事展开的背景虽然没有具体涉及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改变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心理与社会结构的几次运动,但从“跃进公社”、“爱国大队”这样的基层组织结构的设置与命名来看,还是无法摆脱特定时代的影响的。以上两点决定了小说主题的时代色彩,即张扬斗争哲学与弘扬爱国主义。故事中的地点伊犁巴彦岱离伊宁市和边境线都很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边境“伊塔事件”(有民众从伊犁和塔城边境越境去苏联)的发生地之一,小说对“伊塔事件”的形成、过程以及后来的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任何社会动荡其实都是由个体承受并最终演绎为个人命运及富有个案性的生活细节,故小说以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宏观视角为切入点,落笔于具体个人命运及其家庭遭际,自然烘托出了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这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主旋律之一,非常吻合时代的斗争需要和爱国激情的召唤。这无可厚非。不过,小说更多的是对“四清”前后的阶级斗争、“四清运动”的展开方式及参与者心理感受的叙写,这

收稿日期:2013-08-15

作者简介:施津菊,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文学院教授,博士。

种歌颂以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为前提,也适当表现政策中存在的局部不足或执行者的偏颇,都是合乎在 1949 年前的延安文学乃至当代前 30 年文学中基本形成并固化的审美取向与叙事模式的。凡是熟悉那段文学历史的人,现在阅读《这边风景》,其主题设置、故事展开路径、人物类型塑造,恐怕难免因时过境迁而显得无兴趣,一些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给人似曾相识之感,甚至连一些体现人物思想活动和行为品质的主要细节与内心矛盾都有雷同之处,这就使得文本在故事结构与艺术形象表现上均乏善可陈。有论者认为,“因为有了《这边风景》,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历史场景,都得以在文学中有所表现了,文学中的中国历史变得完整”[1],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真不知道应该是把它称为历史还是称为文学了。如果有的评论者愿意把《这边风景》放在当代文学前 30 年的框架中,从那个时代文学以记录党的农村政策与运动演变史为己任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已没有必要再加以讨论;但把它放在现时出版的当下语境来看,上述评价显然有拔高之嫌了。这部新出版的旧作不仅在主题意蕴上毫无新意,语言表达上带有“政治”化的文学腔和“文革”式的类似于“表忠心”的陈词滥调也随处可见,为此而受到诟病当然在所难免。

幸好,因了伊犁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构成的文化与历史的复杂性及其柔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意识形态化言说的僵硬和机械,算是打开了一扇边塞风情的窗户。

当代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实践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争议,一方认为越是民族性的便越是世界性的,另一方则认为后者具有超越性,应不受民族或地域的局限。虽然分歧方各执一词,但前者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少在对一些流派进行界定或概括时,地域性特征往往是一个主要的标志。不仅如此,在对域外文学的译介中,其地域性及相关的文化性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与肯定,甚至把它作为其独特风格的标志,如威廉·福克纳的诸多小说中因一再出现约克纳帕塔法县而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地域性倾向无形之中便具有了一种导向作用并视之为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莫言高密书写的卓有成效,贾平凹商州系列的广泛影响等,也为此提供了有据可查的正面例证。

如果,地域性特色确可作为评价一部文学作

品的重要标准,《这边风景》中的当代地域文化观照及其相应的农村题材叙事,或可说是对当代文学创作颇为难得的一种补充与丰富。就当地风景而言,以往进入伊犁必经之路上的沿途景观——三台海子(赛里木湖)的清澈与碧蓝,海子边上地毯般的草原,远处的蓝天高山与四季常青的松柏,果子沟里的千沟万壑,各种野果林春华秋实的万方仪态,伊犁河的辽远,伊犁汗血宝马的俊美等,在《这边风景》中都如数家珍般地被赞美过,也给读者打开观赏伊犁风景的一扇窗户。可惜的是,这些对自然风光的热情歌颂,因游离于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之外而显得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景了。

《这边风景》的创作时期和所表现的历史阶段,是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盛行的时代,但因新疆的维吾尔族、回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早已在相当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宗教仪式世俗化和宗教礼仪日常化、生活化的既定事实,并已内化为民族心理与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和言谈举止中,自然而然地浸淫着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即使是宗教意识基本被排斥在文学审美范围之外的那个年代,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意蕴也仍然贯穿于信徒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在《这边风景》中有些许流露。作者确实是努力想表现伊犁多民族杂居形成的、既互相影响又保持了各自精髓的民俗民风:作品中对维吾尔人家庭装饰的描绘,对传统的维吾尔男子正装打扮的描述,对维吾尔人待客的饮食及其流程的极尽其详的描写,像展览藏品似的不厌其详地叙写维吾尔人日常喜爱的食物拉条子、馕、奶茶。此外,还有俄罗斯人自制的深受各民族喜爱的格瓦斯、啤沃等,穆斯林重要的封斋、开斋以及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新年日古尔邦节也都被提到,甚至连赌博用的羊髌石(类似于其他地方的骰子)也没落下。这些外在的比较容易体现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地方,在小说中的展示可谓不遗余力。然而,最具新疆风味的还应当是那方水土上的人与独特的文化心灵,以及由此引发的独特的故事情节乃至细节,可惜读着作品,只觉得他们穿的是裕祥,吃的是维吾尔人的馕,说的也是有点维吾尔族腔调的汉话,但骨子里还是当代文学在斗争哲学盛行时代塑造的那些人物类型,主要人物还是典型的“高大全”式的形象,不过是名叫伊力哈穆的又一个“高大全”而已。除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伊犁,除了带有民族特色的饮食以及民族化着装的

不同外,真还看不出更多的区别,有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雷同感!

真正能够表现维吾尔民族精神与信仰内涵及其正面力量的方面,是伊斯兰教对信徒弃恶从善的精神引领作用,即使是在宗教精神并不被宣扬的时代,它仍然在信徒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其行为有所规劝,对其心灵有所引领,但这些在作品中都被轻描淡写乃至忽略不计了。虽然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除了主流意识,其他的基本是被压抑的,但伊犁乃至新疆的穆斯林们对信仰的虔诚并没有真正间断过,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没有。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仅仅靠外化的地貌特征和民族风情描述,其实支撑不起一部真正具有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的丰厚内涵,那不过是给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披上的一层飘浮的外衣。如果仅有这层外衣,里面没有深厚宽广的文化情怀与充盈的精神内涵,反而会流于华而不实和徒有其表。

文本中引人注目的“小说人语”,是整部作品富有特色的一个部分。可以理解为作者希望通过它对“已死文稿”起到点石成金的拯救作用,达到“与自己隔空对话”的理想效果。在文体形式上或可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相提并论,但二者的文思与格调却不可相提并论。前者对历史与人物、事件的理解基本保持了同一性,只是观察角度和文风的不同,后者前后的历史感基本是互为悖论的。如果把“小说人语”作为小说文本整体的一个部分来看,因它是当下创作,就不能称《这边风景》

整体上为“出土文物”;如果把它理解为作者因当初的个人历史境遇和“带着镣铐”不得已的舞蹈才如此紧跟形势,现今再谋求出版显然不合时宜,便是明知可能有蛇足之嫌,也尽可能地以此做些弥补与解释,就更是败笔。因为,无论作者怎样自我谅解乃至自我欣赏,都不能替代小说文本自身审美情趣的不可救药性,也不可能让读者再回到彼时那样的欣赏水平。如果不加“小说人语”,《这边风景》或可作为文献资料出版,作者也可写一个类似说明的内容。以王蒙先生这样的文学地位,这个文献资料还是会有价值的。现在这样出版,恐怕连文献资料价值都值得怀疑了。

以王蒙的资历与聪慧,他完全明白《这边风景》的质地已经“不可雕也”;即使作者自己可以因为对青春的怀念(那可能是每个年逾古稀或耄耋之年的人都会产生的生命情结)以及爱屋及乌地把那时的荒唐事也当作伟业来看,读者也未必就会抱着那种心态去欣赏。其实,作者是明知“它的先天的绝症”和“已经逝世”^[2](P702-703)]到死得不能再死了。如果1978年至1981年是因政治上“不符合新时期的时宜而前功尽弃”^[2](P704)],那么,现在就更应该弃之如敝屣了,不仅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缺乏文学的审美价值。尽管作者希望“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从遗体到新生”^[2](P702)],倘若果真就此“新生”,那可也真的“文学也万岁”^[2](P703)]了。再倘若,这个文本真的“仍然活着,而且很青春”^[2](P703)],那么,文学恐怕就要再次沉沦。

参考文献:

- [1] 何瑞涓.《这边风景》:虽九死而未悔的当年好梦[N].中国艺术报,2013-06-24.
[2] 王蒙.这边风景[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An E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birth of An Old Writing by Wang Meng

SHI Jinju

Abstract: An old 1978 written novel of *This Side of Scenery* published by Wang Meng this year has caused heated discussion. The novel has almost nothing to recommend in terms of theme setting, narrating model, image creation as well as political literature tone. The local feature, being decoupled from the plot and story, is also far fetched. There seems redundant to put storyteller's words inserted in the writing, which is an apparent paradox of the historical feeling of the narration. It is shouldn't be reborn of this novel which has deadly disease of the deficiencies of nature and died in fact.

Key words: Wang Meng; *The Side of Scenery*; nation feature; storyteller's words